

也许，我文学事业的根
那片泥土之中的。而今，当
纸的时候，老榆树那苍劲的

一些孩子到别人家山里打
好得多。

我读书成癖。读过之后，
们讲讲故事。从此，我开

小学毕业之后，考入哈尔
座中学离我家十五华里。

们屯的全体学生一律走
用。走了相当长的路才到

了毕业证书。这期间，我做
黑板报上发表过打油诗。并
加入了共青团。

三 不怕虎

第六中学，在某种意义上
第一学校。校舍按当时的高中

摇曳。那掠过庄稼稻头的
合一样，在稿纸的横格间

童年时代，就象刚刚拱
充满了时代的活力和幻想。

想是当一名汽车司机。我
飞驰的小房子，神奇而不可

来了一台汽车，我便和一群
一块围着，一直看到汽

父亲自己，历经坎坷，
希望我继承这些弱点。希望
直面人生。因此给我取名笑，
证明，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我过去的四十三年里，我一
活，不知忧愁为何物。

的。学生主要由于干部子弟，华
成。学生的食堂要分大、中、
些平民子弟是以学习成绩的
生的。吃的当然是七元钱一
这七元钱的伙食费，我也要
，我父亲也在一座中学当校
中的同行。交不上伙食费的时
的一个案子。我至今还记得

使我有机会跟当兵的叔叔们
：他们那里借到了《钢铁是怎
和马拉的故事》等书籍。我
，在院子上的麦秸堆里，
直读到夕阳落山。因为我耽
：鹅挖曲麻菜，灰灰菜，屁股
：的滋味儿。在这方面，读过几
比母亲开明些。他认为，我

自 中 青 年 作 家 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青年作家

自传

中青年作家自传

ZHONGQINGNIAN ZUOJIA ZIZHUAN

责任编辑：戚积广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2 插页

32 开本 13.25 印张

310,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4.60 元

目 录

张抗抗	从西子湖到北大荒.....	1
叶文玲	驽马十驾功不舍	28
金 河	我从山中来	52
鄂 华	走上文学之路.....	78
叶 辛	在屡遭挫折的道路上	94
温小钰	咆哮时代的幸运儿	108
理 由	蓝色的梦	123
张笑天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137
王 汪	笔耕三十年	154
谭 谈	我走过的弯弯山道	172
胡 昭	唤回逝去的青春	190
顾笑言	力不从心的攀登	201
邓 刚	艰难的爬行	218

浩然	我是农民的子孙	234
韩汝诚	笑比哭好	257
张廷竹	弹指一挥间	281
周梅森	我的世界和我的梦	298
中 申	我这半辈子	315
李玲修	母亲的梦与我的梦	331
朱苏进	想到便说	353
陈国凯	在学习创作的道路上	367
树 茶	路程	378
叶永烈	“爬格子”的历程	398

从西子湖到北大荒

张抗抗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美丽的西湖边度过的。那是苦难深重的祖国从受宰割、受凌辱的亚洲大陆站起来的第二年。我如同西湖飞来峰岩石下探头的一棵小草，大口大口地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在春天的阳光下生长起来。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在40年代的黑暗岁月，彷徨苦闷，颠沛流离，经历了追求、反抗、受欺骗、受迫害的曲折道路。在决定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庄严时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革命和反革命进行血肉搏斗的时刻，他们是坚决同共产党、同人民站在一起的。

大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字。是的，从我出生之日，我的父母亲给我取名抗抗，自然寄托着一种信念。从我开始懂事到成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象是个男孩儿的名字，很有力量，很响亮，有特色，决不会和别人雷同。所以当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到过我应该有一个笔名。但尽管我对自己的名字有偏爱，我却不能不承认它存在着一个“先天性”的缺点：因为我是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常常有

人粗心大意把“抗抗”叫做“杭杭”。记得六九年我从杭州到黑龙江农场的第二天，连长点名时一连喊了好几声“张杭杭”，我就是不吭气，一直到他纠正了我才答应。可见我这个名字也是会招惹麻烦的。按照我父母后来的解释：“抗抗”这两个字，不仅因为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也不仅因为我在抗美援朝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希望我因此具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由于我的名字注定要同抵抗、抗御、反抗等相联系，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将会永远不得安宁。

我两岁的那年，就随父母进了西湖边茅家埠的一幢小楼去接受审查。那是一个干部学习班。不久以后，由于我过去一直无法真正了解的原因，他们一起离开了工作三年的《浙江日报》。

我的父亲九岁的时候，从祖籍广东新会来到上海当学徒，靠自学取得一点文化知识。他从十八岁逃出上海“孤岛”沦陷区开始，多年搞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在上海一个新闻专科学校半工半读，曾经当过文艺记者，编辑出版过进步的文艺丛刊。1946年加入上海地下党。1948年春，党的地下组织派他来杭州工作。以一家晚报总编辑的合法身份进行地下活动，曾组织领导两个县的地方武装起义斗争。1949年解放时，他才二十六岁，是浙江日报政教组的负责人。我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个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燃起爱国的热情，又在人民解放的旗帜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怎么会在解放后受到那样大的怀疑和误解，在没有进行任何外调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处理。他调离报社后，曾在机关当过多年编辑，后来下厂当车工，去果园栽培水蜜桃和葡萄。“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做泥水工、搬运工，最后成为一个熟练的钣金师傅。所有这一切体力劳动，只不过强健了他的筋骨，丝毫没有削减他青年时

代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以至在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幸遭遇以后，他终于在今年“三案”处理落实政策中，平反改正，撤销原处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来。我从小所看到的他那种对党、对革命的真诚和豁达开朗的坚强性格，常常感动和难过得泪下。这对于我这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女儿来说，不仅在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对我的世界观、意志、道德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的母亲却同父亲有着完全不同的素质。她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幻想。她生长在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一个小镇，抗日战争的浪潮使她离开沦陷区到天目山的中学念书。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进步活动，使她得到滋养。1941年的“皖南事变”使天目山地区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她不得已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镇上的小学校教书。1944年，她认识了当时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对真理的向往，对现实的不满，对文学的兴趣，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当时她的父亲曾一心想把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她却毅然同我父亲一起去了上海，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结束后，党的地下组织在闸北地区办了一所小学，在这里工作的都是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一人一月只有一二元的零用钱。但我的母亲还这样告诉我：她在这所小学里工作和生活的两年，是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日子。就在这里，她写下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1948年印成了一本《幼小的灵魂》出版，封面是当时在美术界初露头角而现在已成为中国名画家的黄永玉的作品。她的这些儿童作品，经过三十多年，我还非常爱读。有一篇《小学校和兴隆当》是这样写的：

……窗外，另一块空地上，一幢两层楼房的屋架

已经撑起来了，那些裹着破布片、黄脸孔、肿手烂脚的、把汗和泪滴在兴隆当的铁格子窗前的人，正在拖着木料，建造另一家“当”。

“这是一个造当铺的世界！”女教师跌坐下来，长长的黑发披散了，圣洁的脸上，带着一个愤懑的表情。她迅速地执起笔，在信上写道：

“……就是为了这当铺，这丑恶，我们还得把这小学校支持下去！……”

窗口，这声音还在飞出去。

从我的母亲去做中学语文教师开始，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母亲从干部学习班回来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一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这次却竟然没有在命运面前哭泣。她尽力照顾父亲一家，使他们苦苦度过了凄凉的日子。她带着我，相依为命，把对生活的爱全部倾注到我身上了。她教会我背诵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会在她学校举办的文娱晚会上，用童稚的声音清晰地朗诵起来：“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得到了掌声和赞美。她一直把我带在身边，让我在她任教的中学隔壁的一所小学念书。每天我们步行，早出晚归。路上的时间我们就用来讲故事，学普通话，讲一点班级里的笑话，或者念自己写的诗。妈妈总是要求我尽量讲得明白、生动。我现在还记得，我给妈妈念过这样两句诗：“太阳眯眯笑，老牛吃青草……”回到家里，我伏在桌子上写：“路灯亮了，我和妈妈回家了……”大概从那时候起，我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文艺兴趣，爱好朗诵诗和表演节目。有一年妈妈过生日，我还写了一首诗送给她，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

我向妈妈提了一个问题：“你和爸爸经常讲到‘点心’（典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给我吃？”这使妈妈用那样吃惊和好笑的眼光看着我，随后她马上告诉我，这种“点心”（典型）是在书本、小说里的，长大了就可以“吃”到它。这可以算是对我幼小心灵最初的启蒙。十岁那年，我从一位客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我就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开始把每天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是我的第一个日记本。到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完了四本这样的日记本，它们现在很好地保存在家里。这些日记中有关于女同学之间的友情、有吵嘴的经过、还有顽皮的男孩子们的事情。内容全是真实的，可以说是我学习写作的最初记录。假如以后我要写一本少年时代的小说，这些也许就是有用的素材。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并不宽绰，虽然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却把大部分钱用来负担我父亲的弟妹们上学。因此，母亲不能象别的女老师那样，把姑娘打扮得花俏漂亮，我记得我的布鞋都是外婆给做的，妈妈平时连冰棍都很少给买。但是她总是尽量想办法保证我必需的学习用品。每次北京、上海来了好剧团演话剧、歌剧，妈妈总是订了票带我去看，而且总是花最贵的钱买甲级票。当然，她要求我看完戏以后，复述故事，谈谈感想，这对于我并不很难。所以那时候生活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跟妈妈去看戏。我长到很大才明白妈妈那时候的苦心所在。她是个责任心极强的班主任，常常我一觉醒来，看到她还在灯下伏案批改作业。她对待学生是平等的，民主的，从不呵斥他们，好象是他们的朋友。没有人能够不喜欢她，直到现在，家里还常有外地工作的学生来看她。每到暑假，妈妈就带我到外婆家去，江南水乡那拱形的石桥，两岸的桑林，绿色的河道上开紫花的水草，还有在河边淘米时一点不怕陌生地游到你淘箩里来的小鱼……都使我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妈妈经常从

学校借回来那么多的童话和儿童文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孙漂流记》，都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妈妈有时开玩笑就叫我“丑小鸭”，我非常喜欢安徒生的这个童话，作者那种善良的同情心，深深打动了，我有时觉得自己也象一只可怜的“丑小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飞到天上去。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扁桃腺发炎不能上学，妈妈借来的儿童书都看完了，一个人躺在床上实在无聊，我就从妈妈枕边找出一本刚刚出版的《苦菜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我感到惊奇，也使我神往。我开始觉得文学家是最可尊敬的人，因为他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我阅读了大量现代和近代的小说、散文，凡是新出版的文艺书几乎无一例外。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按照我父母的欣赏观点，他们最推崇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因此，我也喜欢《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这些都是我早期读的书。我自己认为，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雅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该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文学应该帮助人民去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诱发人对文学的兴趣，我“发现”文学可以寄托和表达自己无穷无尽思想和感情，于是开始幻想自己长大也去写作。

除了读书以外，我的年龄稍长后，我的父母就开始注意培养我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注意周围事物的习惯。爸爸经常在星期天带我们全家（这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淘气的妹妹）到西湖风景区去玩。去得最多的是玉泉植物园，我们带些面包和水果，在

草地上铺开一张塑料布，就是一顿别有风味的午餐。每次，爸爸总要教给我几种植物的名称，什么海棠啦、杜仲啦，下次去就得“考试”。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我不敢不记住，免得挨克。有一次傍晚我们在湖边散步，爸爸指着飞掠在湖面上的一群群黑影问我那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鸟！”他很不高兴地说：“天黑了，鸟儿早都回窝了，怎么会是鸟呢？再好好想想——”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不是鸟会是什么。后来还是妈妈救的驾，告诉我那是蝙蝠。只有蝙蝠这种夜行动物才会在傍晚的湖面上飞掠。回家路上，爸爸把我好一顿批评，我差点掉眼泪。一直到现在我每次回杭州探亲，看到天快黑的时候，湖面上飞翔的黑影，就会想到这件事。又有一次，爸爸买了许多不同品种和颜色各异的水蜜桃，要我认识每个品种的名称，其中一种金黄金黄色的桃子，我从来没见过，他要我猜猜这个品种的名称，我随口回答说：“它的颜色是金黄的，应该取名叫黄金桃。”这时他那常常紧绷的脸才笑起来，说：“你呀，唔，总算还有点想象力。”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是写我们自己办红领巾小医院的事情，编辑认为很有生活气息。文章发表后，编辑部给我寄来十元钱稿费。妈妈用它给我买了一套维·比安基的《森林报》和其它书。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书，当然很得意。当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给我来信，叮嘱我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他不仅是我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也还是我创作上的老师。这些年中他一直关怀鼓励着我，倒不是因为他早就发现了我文学上的才能（我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而是因为他把培养下一代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点，我永远深深地感激他。考入中学以后，我

又陆续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两篇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这几篇习作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是重要的。它们使我较早地开始了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我那时想：这么说，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神秘，它是可以学会的。

轻易地得到成功，往往使人放松努力。那时我实际上并没有懂得文学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业。有一次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是期中的开卷考试，一周交卷。我很快写完了，扔在桌子上。妈妈看到以后，对我轻率自满的态度非常生气，她批评我，我不服气，她让我好好修改，我就是不肯改，一赌气关了灯上床睡觉。很久很久，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暗中只听到妈妈轻轻的叹息声。我想：我为什么让妈妈生气呢？我原来是这么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过了好一会，我偷偷穿上衣服起来，开亮台灯，开始苦苦思索修改我的作文。其实妈妈并没有睡着，她一直等到我第二次上床。她没有表扬我，却说：“要是不行，明天还得改。”她平时特别宠爱我，但在我的学习上她却是严格的。要想在她面前混过去很难。她曾把我一篇不愿修改的文章撕成两半，害我哭了好半天，同样，我在小学六年级时担任全校少先队大队长，获得全区普通话比赛第二名，以及省电台《迎春诗会》录音广播我的诗朗诵，都得到了妈妈最严格的训练和督促。除了她那种近乎天真的纯洁使我懂事太晚，过于幼稚以外，无论从哪方面讲，她都是我第一个启蒙老师。为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老师给她贴的大字报中有一条罪状就是“培养女儿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

1963年秋季，我幸运地考入了全省重点学校杭州一中。这年我是十三岁。这是经历了三年天灾人祸以后，人民对未来重新滋长希望的年代。多少善良的人们，出于对领袖无限忠诚的

真实感情，正在为某一种惯性势力所控制，而不知不觉地向极左的方向倾斜下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叫人透气也有些急促。平静的校园，大讲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路线，又是考验人们阶级立场的时候了。

在报考前后，我一直担心自己的家庭问题会成为最大的障碍。要想念全省的重点学校，恐怕是一种梦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直跳，我完全是凭较高的分数考进去的。进校后不久，我得到了全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被选为班级的文体委员。我们演出了妈妈为他们学校写作的一个小歌剧《放学以后》，在全校得了奖。由于我发表的习作，常常收到朝鲜、越南小朋友们的来信。同他们建立了通信友谊。我没有想到，正当我的面前洒满阳光的时候，阴影突然笼罩。自从我在“中学生登记表”上如实填写了我的家庭情况后，我的处境就一落千丈了。

我在杭州一中三年，可以说完全是在精神压抑的状态中度过的。当时的杭州一中集中了省、市级机关和省、市、军区的大小干部子女，他们进校可以免试，在校有极大的优越感。而那些凭分数考进来的普遍职工子弟却处处受到了限制。我的班委被无缘无故地免去了。常常被团干部找去谈话，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我不止一次向团支部提出申请，但是考验了又考验，依然毫无结果。有一次政治期终考试，只因我谈了如何同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竟然只得了三分。我伤心极了，要知道我答得多么认真，可是政治老师却认为我这样的人答得再好也根本不配打五分。打了五分就是他的立场问题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参加国庆游行，就是这个政治老师（他是我初三的班主任）竟然不准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入列。杭州一中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我们这些家庭上稍有问题的人就特别引人注目。我凭白无故受到这种打击，内心自然十分痛苦。我想我

的父亲不是一个老地下党员吗？他曾经卖掉结婚戒指，作组织的活动经费，怎么会是坏人呢？我百思不解，只好加倍努力学习，加倍刻苦改造自己，加倍积极地为集体工作……然而都无法换得他们的信任。学校生活使我惶惑，我只好埋头钻到我的功课和文学书籍中去。也恰恰由于这种逆境，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柱。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良心和智慧。用良心换取智慧，把智慧献给良心。这个良心，就是一个多余的人，被社会歧视的人对生活炽热的感情和责任。

我的母校是一所设备完善，校舍宽敞而环境幽静的学校。尽管它使我少年的心感到窒息，但我仍从她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至今对她还是十分眷恋和怀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鲁迅先生二十年代曾在这里任教，后校园设有一座鲁迅纪念亭。初中部和高中部都组织了鲁迅文学兴趣小组，我认真地参加了这个小组的活动。“杭州一中”校徽上的四个字就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佩戴着这个校徽，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就油然而生。文学的激情自然而然在血液里流动。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在这所学校里一连三年都遇到了极好的语文教师。她（他）们使我懂得了祖国的语言文学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值得我们为它的保存和发展而努力。这几个语文教师讲起课来娓娓动听。生动活泼，对学生又和气可亲。我的作文曾多次被拿到班上作范文分析。我相信自己仅有的一点语文基础知识，都是在他（她）们那里获得的。象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相看的“丑小鸭”，也只有在语文教师那里，还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

那时候全校每年都有文娱会演。我们常常把妈妈学校获奖的剧本拿来演，在学校获得了好评。到了初二下学期，我决心自己来尝试一下，由我执笔写了一个小话剧，叫做《斗争在继

续中》，写一个农村的少先队员如何同地主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戏排得差不多了，请妈妈来看，想让她大吃一惊，看看我是多么不简单，结果大失所望，她看了一半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生搬硬造，根本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我在同学面前丢了脸，伤心极了，以后一连好几天不理妈妈。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当时文艺思想上阶级斗争公式化的流行程式，已经侵入到我们少年的文艺活动中来了。我实际是从政治概念出发来编造情节的，当然不足取。到了初三年级，我们几个同学又合编了一个两场话剧《地下少先队》，写解放前夕地下少先队员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我演其中一个卖香烟的女孩子。这次演出居然搞得很热闹，很有趣，音乐老师把我们大大表扬一顿。后来我们还写过一个抓特务的小话剧，改编过一个教育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小话剧，都是配合宣传的。这也算是我中学时代文学活动的一部分。

我在中学三年中所接受的，是老师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灌输的种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似懂非懂的政治概念。这使我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我确立了自己将来一定要到工农中去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志向。我甚至决心不念高中了，到新疆建设兵团去。那时我们中学生中流传一本很动人的书叫做《军队的女儿》，我对书中的女主人公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常梦想她那样远远地离开家庭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还决定到了农村后养一只狗，把它训练得象电影里的猎犬一样。1966年上半年。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慷慨激昂的批判文章，帽子棍子满天飞。我的父母常常背着我议论些什么，我在感情上同他们似乎疏远起来了。《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始以后，我躲在学校的阅览室里，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理论文章《“火种”必须批判》，批评艾明之同志的长篇小说《火

种“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而我实际上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今天回忆起这件事，我都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被一种无形的紧箍咒束缚住了。当我后来到工农中间，经过了数十年的磨炼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那种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1978年夏天，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全国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诗人芦芒伯伯。在宾馆他的房间门上，我发现了艾明之的名字，原来他们两人同住一室。我在门口站了好久，由于羞愧而进退两难，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站在他们面前，芦芒伯伯把我亲切地介绍给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那种愚蠢的事情，您会原谅我们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道歉也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样可怕的年代。那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生活的教训是多么残酷啊！

我怎样来回忆那梦魇一般的混乱年月呢？1966年，也就是我刚满十六岁这一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色彩展现出来，吸引着人们的全部注意力。我在学校的九年间，对生活中的任何现象，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我们听到的任何革命口号都是崇高而神圣的。在我们纯洁的心灵中，正在形成一种非常适合于接受鼓动的盲目信仰和观念形态。运动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置身于极其怪诞的矛盾之中。我在学校里狠批“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批判“封、资、修”的大毒草，而回到家里，我就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我日夜提心吊胆有人来抄家，但在学校里批判别的“黑五类”子女照样不肯落后。社会上“破四旧、大民主”那种轰轰烈烈的气势，使我产生对于斗争的渴望，但又厌恶后